

张大可 著

三国史研究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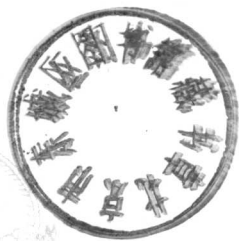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90285620

张大可 著

二国史研究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1236
100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国史研究/张大可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3. 1

ISBN7 - 5075 - 1439 - 0

I. 三… II. 张… III. 中国 - 古代史 - 研究 - 三国时代
IV. K23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4535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 <http://www.hwchs.com>

电子信箱: webmaster@hwchs.com

电话 (010) 83086663 (010) 83086853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新科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32 开本 18.75 印张 470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4000 册

定价: 28.80 元

前 言

这本《三国史研究》论文集，初版于1988年，是建国以来第一本研究三国史的个人专集，了却了上大学时的一桩心愿。1959年，学术界掀起了一场人为的替曹操翻案的运动，当年全国报刊都卷进了这场学术讨论中。据不完全统计，当年报刊发表三国史论文166篇，其中160篇都是讨论曹操的，十之七八为曹操鸣不平，这是很不寻常的。1960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曹操论集》，选刊了37篇论文，囊括了许多学界的名流。这场讨论是由郭沫若与翦伯赞两位学界泰斗发起的，自然来头不小，影响深远。不过争论的当年，我正在就读高中，无心也无能力顾及，可以说是漠不关心。1961年，我上了北京大学，学习中国通史，自然要接触这一问题。奇怪的是，我们这些当年的青年学子却没有一个赞同翻案者的高论。大家热情很高，于是开展了一次大学生的学术讨论。初版前言开场一段回顾了这场讨论，不妨摘录如下，以见出版这本集子的因由。初版前言如是说：

我研究三国史的契机，要追溯到二十多年一次大学生学术讨论会。时间是在1962年仲夏的一天下午，地点在北京大学学生宿舍楼第三十二号楼的四楼上，参加者北京

大学中文系第1961级古典文献专业班全班同学，人数二十余人。当时，我是这个班的成员，中国通史课的课代表。当这门课程讲到汉末魏晋之时，我们组织了一次大学生学术讨论会，同学们都经过了近一个月的认真准备。我们讨论的议题是对学术界替曹操翻案的问题展开争鸣。1960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曹操论集》，有不少同学都找来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有的还搬出了《三国志》和《后汉书》翻查原始资料。我们当时都还十分稚嫩，也有点初生牛犊之气，敢于非难时贤。在讨论中谁都不否认曹操统一北方、削平群雄的伟大功绩，但谁也弄不明白像曹操这样一个极端奸险诈伪的权谋家，不知怎么在翻案发起者的文章中变成了古代人民的解放者！在“文革”的十年风暴中有一句口号：“愈是清官愈要批判。”这是否是历史对这场替奸臣揭去奸臣帽子的翻案运动所作的总结或惩罚，留待未来的历史家去作定论罢。今天回顾这件往事，说明了六十年代的青年精英对于时代的思考。我个人则从此逐渐养成了对争鸣问题的再思三思的习惯，并由此而引发对三国史一系列问题的探索，于是有今天的这样一个成果。

曹操是一个伟大的双重性历史人物。陈寿的《三国志·武帝纪》是一篇良史笔下的恢宏大传，充分肯定了曹操的成就，同时也不隐讳他的过恶，用两句话概括就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的一生，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的这个两面性。学术界历来是正面肯定曹操的，而在舞台上，以及民间故事则基本是引曹操为鉴，抨击奸险诈伪。可以说曹操在人民心目中做了反面教员，这也是他咎由自取。既然是自己写下的历史，又是人民定下的警世艺术形象，又有何案可翻？至于各种

历史教科书，没有一本书是否定曹操的，更是无案可翻。可是为什么像郭沫若、翦伯赞这样重量级的人物却煞有介事要替曹操翻案呢？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历史家可以写出各式各样的历史，但历史的真实却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谁想要颠倒历史，谁就要失去他自己的分量。六十年代的那场大学生学术讨论会，虽然没有留下音响，但对于参加讨论的人却是一次思想解放，这对每个人后来的生活道路都是很有教益的。如果说“文革”伊始，我们就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是得益于这场学术讨论的。回想当年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那时发愿研究一番三国史，于是后来就有了这样一个成果。这次重新推出，得益于复旦大学吴金华教授在2002年10月组织的《三国志》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者还有人提起这本书，我也想通过重出激发起自己的热情，再认真地对三国史下一番功夫，做出更好的成绩，以此做一个标帜。

论集收文26篇，附录四篇，分为七组。第一组文三篇，总论三国鼎立的形成和汉末军阀；第二组文六篇，论形成三国鼎立的三大战役及外交；第三组文三篇，论三国的创业之主；第四组文五篇，论三国的重要谋臣；第五组文四篇，论曹魏屯田、孙吴部曲、孙吴对江南的开发，以及三国民族问题；第六组文四篇，论诸葛亮的北伐及三国的统一。末篇是建国以来半个世纪三国史研究述评，与三篇附录构成了第七组，为三国史研究提供资料信息。附录二，关于三国时期的考古与文物，是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研究员谭良啸应邀提供的。附录一与附

录三两篇，是复旦大学博士后司马朝军提供的。司马朝军在其恩师吴金华教授指导下为2002年10月《三国志》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供了《1978—2001年三国史及〈三国志〉研究论文目录》，以及计量分析的文章，这对于进一步开展三国史研究有极大的帮助。我征得司马朝军的同意，将他整理的信息资料附录在本论集之后，以飨读者，为了配合三国史研究的述评，我做了技术改编，制成编码索引，并将论著部分做了分类。我的学生杭州商学院徐日辉教授提供了诸葛亮研究会的十二本论集目录，司马朝军又补充1978年以前的论文目录，我又补充了一百余条目录，去其重复方才成为目前这个样子。对于司马朝军的无私奉献，以及他的导师吴金华教授的支持，表示深切的谢意。华文出版社提供了再版的阵地，从社长到责任编辑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张大可

2003年1月

作者简介



张大可 1940年生，重庆长寿人。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曾任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甘肃省中青年历史学会会长。1990年调北京，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中文系副主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室主任。1995年底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研究所任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历史文献学和秦汉三国史的教学与研究，在这两个方面已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个人学术专著8部，主编高校教材三种，合作论著10余种，其中5种论著获全国及省级社科优秀图书奖。主要论著有《三国史研究》、《三国史》、《史记研究》、《史记全本新注》、《史记文献研究》、《史记精言妙语》、《史记论赞辑释》、《司马迁评传》、《张良萧何韩信评传》（合作）、主编《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记教程》等。

R508/11

3732

目 录

前 言	(1)
三国鼎立形成的历史原因	(1)
董卓及其凉州兵团	(20)
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	(33)
官渡之战及袁绍集团的覆灭	(48)
赤壁之战与三国鼎立	(67)
赤壁之战考辨	(78)
夷陵之战与三国鼎立的地理均势	(92)
蜀失荆州并非“重益轻荆”	(106)
三国形成时期的外交	(115)
论 曹 操	(136)
论 刘 备	(160)
论 孙 权	(178)
论曹操的智囊团	(195)
论二荀程郭	(213)
论凉州智士贾诩	(225)

论诸葛亮	(237)
论孙吴儒将	(252)
论曹魏屯田	(266)
论孙吴部曲兵制	(286)
论孙吴政权对江南的开发	(309)
论三国时期的民族政策	(323)
论诸葛亮出师	(339)
再论诸葛亮出师	(359)
论三国一统	(371)
论三国一统人物	(398)
建国以来三国史研究述评	(406)
附录一：(1978~2001)三国史与《三国志》 研究现状的定量分析	(436)
附录二：三国时期的考古发现和文物研究概述	(450)
附录三：建国以来三国史研究论著书目论文篇目索引	(460)
附录四：一百零五位作者三国史论文编码索引	(589)

三国鼎立形成的历史原因

一、多因素的历史原因

三国鼎立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特殊的历史课题。不仅三分故事自宋代以来由于平话、戏剧、小说的影响，已是家喻户晓，而且形成三分的历史发展，威武雄壮，可供我们许多有益的启迪和借鉴。但是三国鼎立形成的历史原因这一课题的研究，似乎还是一个薄弱环节。目前史学界已成定论的观点认为：“三国鼎立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地区封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分裂倾向的加剧”。其理由是：“长江流域上下游几个区域的封建经济，发展到了勉强可以自给和彼此均衡的程度，给南方孙、刘的割据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同一时期北方的国家则由于社会经济受到割据混战的严重摧残，无力消灭南方的国家，以统一中国^①。”这就是三国鼎立的“必然性”理论，可名之曰“经济均衡论”。史学界已发表的学术论文，出版的学术论著和各种教科书，对三国鼎立的看法都没有越出“经济均衡论”的藩篱。事实上，早在春秋战国之际，长江流域已有巴、蜀、楚、吴、越等国家的建立，何待于两汉以来的江南开发形成经济均衡！割据长江上流的刘璋、刘表，甲兵资实，不弱于孙吴，更不减于刘备，何以要待刘备来建

^① 翦伯赞：《中国历史纲要》第2册第5页。

立蜀汉形成曹、孙、刘三家对峙！可见“经济均衡论”是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

从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历史发展的整个长河来看，王朝兴衰，军阀混战，群雄割据，南北对峙都一再出现，而三国鼎立是惟一的一次历史存在，可见这一历史局面的出现是一个特例。特例是历史发展中的变异，就像生物遗传工程上的变异一样，有它变异的特殊原因，而不能用“常规”的必然性理论去解释。

中国自秦汉以来的封建王朝，最长的莫过于两汉、盛唐、朱明、大清，这几个朝代都没有超出三百年。短命的王朝如秦朝、新莽、隋朝只有十几年或几十年。每一个封建王朝解体，都要出现军阀混战，群雄割据，而后走向统一，形成了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周期性运动^①。这可以看作是封建地主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运动。因为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即使在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下，“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②，中央集权力量一旦削弱或解体，就要出现群雄割据的局面。而割据混战破坏生产，给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所以它是不能持久的。人民要求和平，反对战争；要求统一，反对分裂，这是历史的趋向。群雄割据中的优胜者，顺应历史的趋向，他就能够削平战乱，统一中国。秦、两汉、隋、元、明等封建王朝末年的战乱，很快走向了统一，这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常规。南北对峙就打破了这一常规。中国历史上有东晋与北方十六国之对峙，有南北朝之对峙，有北宋与辽之对峙，有南宋与金之对峙，这些对峙历史都有比较复杂的历史原因，而不能简单地用

① 《三国演义》第一回开篇曰：“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不能认为是简单的循环论观点，而是对于中国封建社会朝代兴亡分合的总概括，而发展方向是走向统一与巩固，故引作“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②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卷第587页。

“经济均衡论”加以解释，更何况三国鼎立。

形成南北对峙局面的主要历史原因，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迫使政治腐败的汉人政权退到南方，依恃长江天堑作为屏障而偏安江南。由于这样的历史条件一再重演，所以南北对峙的局面也就一再出现。东晋与南宋两个时期的南北对峙，南方的经济实力大大超过了北方，而人心向背也有利于南方，因此祖逖北伐、桓温北伐、刘裕北伐、岳飞抗金都取得了节节胜利，但是由于南方政权的政治腐败而使北伐总是归于失败。显然“经济均衡论”在这里是无法解释的。东汉末年没有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而是军阀混战演成了三分，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因而形成了一个历史发展的特例。

“经济是基础”，任何时候这都是立国的基本条件。东汉末年的战乱，北方经济残破，没有力量支持曹操不停顿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的确是三国鼎立的一个重要因素。曹操南下荆州，接着又东进赤壁，连续大规模作战，北方经济无法承受。吴国的朱治就说：“中国萧条，或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殣相望，士叹于外，妇怨乎室，加之师旅，因之以饥馑，以此料之，岂能越长江与我争利哉^①。”周瑜论曹操必败，原因之一是“又今盛寒，马无藁草”^②，也说明了北方后勤供应不继，士卒乏衣粮，马乏草料，乃是一种冒进。但是，当时曹操已得天下十之七八，长江上流的益州牧刘璋遣使请降，只有区区江东六郡相抗，且孙权内部未靖，山越未服，南北对抗众寡悬殊，并未形成均衡。只要曹操计划周密，时机得宜，不冒进赤壁，完全有统一中国的可能。赤壁战后，荆吴之势强，刘备入蜀，三国鼎立形成，才出现了南北的经济均衡，对于“三分对峙”，有一定的影响，但仍不

① 《三国志·朱治传》裴注引《江表传》。

② 《三国志·周瑜传》。

是主要的因素，因为曹魏的实力，仍大大强于吴蜀二国力量之和。尤其是蜀国这个弱小政权，远不敌曹魏，而诸葛亮居然能够屡次北伐。蜀国所恃是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以及吴蜀两国的互为犄角之援。经过几十年的对峙，北方经济恢复，吴蜀两国政治昏暗，人心反向，曹魏和西晋的人力、物力占了压倒的优势，三国也就归于一统了。经济的因素最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以此来反证，三国鼎立决定于南北的经济均衡。

三国鼎立有着多因素的历史原因，经过极其复杂的历史演变才形成的。如果我们划分一下三国鼎立的历史发展阶段，就可明显地看出来。不过划分三国历史的发展断限，十分复杂，难以用一个标准来统一，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分段标准，都可成立。排定历史编年，可以王朝体系划分历史断限，三国鼎立始于公元 220 年的曹丕称帝，迄于公元 265 年的西晋建立，前后四十六年。在西晋建立之前两年，蜀汉已亡，历史进入了晋吴两国的南北对峙。但作为一个有始有终，因果相连的历史时期，三国纷乱的历史，应起于公元 190 年的军阀混战，迄于公元 280 年的西晋灭吴，前后九十一年。研究三国历史，不追溯东汉末的军阀混战，就不能说明三分的由来和三国史事的因果；不讲西晋灭吴，就没有结尾。这九十一年 的纷争历史可以从两种角度来划分三国历史发展的断限。从三方对峙国别史的角度来叙述，可划分为三国形成时期、三国发展时期、三国走向统一时期三个阶段。从公元 190 年到 220 年是形成时期；从公元 220 年到 239 年魏明帝之死为三国发展时期；从 240 年到 280 年是三国衰落走向统一时期。这样划分是着重讲三国形成后的历史发展，而把三国的形成只是作为一个引子。但是我们如果侧重于三国鼎立为什么会 产生，则应着重讲三国形成时期的历史，三国对峙历史不是主要的叙述对象，这样发展断限的划分就会迥然不同。陈寿的“三国志”则是侧重于三国形成时期的历史叙述，即详于乱而略于治，

或者说详变革之世，而略升平之世。本文着重探讨三国鼎立形成的历史原因，从这一角度可将九十一年三国历史划分为群雄割据、三国鼎立形成、三国对峙并走向统一三个阶段。公元190至207年是东汉末群雄割据阶段，前后十八年，从人才均势上形成了曹孙刘三个集团。公元208年赤壁之战至公元229年孙权称帝，是三国鼎立形成阶段，前后二十三年，三方斗争交错，内容复杂，形势发展瞬息万变，最终形成了三分的地理均势和政治均势，三国鼎立才得以确立。公元230年至公元280年，是三国对峙并走向统一的历史阶段，前后五十一年。半个世纪的“三分对峙”，地理均势起了主要作用，南北的经济均衡作为地理均势的补充也起了重要作用。研究三国鼎立不同阶段的历史发展，尤其是第一二两个阶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内容，可以鲜明地看出，“形成三分”实非某种单一的历史原因所决定，也并非必然要出现的局面，而是各种各样的主客观原因，通过无数的偶然事变，交互作用的结果。当然，历史的偶然又存在于必然之中。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揭示这种存在于必然之中的偶然是怎样引导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是将复杂的历史内容规范在简单化的必然性公式模式中。

所谓“必然”，是指历史发展的趋向和客观的历史条件。东汉末年豪强地主集团的经济膨胀有很大的割据性，必然带来军阀割据混战；反过来，割据兼并必然导致统一，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趋向。南北的经济均衡和吴蜀两国所依恃的地形险阻，是客观的历史条件。所谓“偶然”，是指东汉末年军阀混战走向统一的过程中，出现了三分鼎立的局面。这一局面是由于三分的人才均势，三分的地理均势，三分的政治均势等多种历史原因的交叉才形成的。三分的人才均势，三分的地理均势，三分的政治均势都是“偶然”的事变。这些历史事变是“人谋”起了主导的作用。下面分层次论述三国鼎立形成的多因素历史原因，并着重分析

“人谋”的历史作用，以供讨论。

二、东汉末军阀混战所形成的 三分人才均势

三分的奠定，首先是在军阀混战中，使汉末人才分散，形成了曹孙刘三个坚强的领导集团。

汉末军阀，穷凶极恶的董卓，顽悍乐杀的公孙瓒，贪利赖宠的陶谦，倏彼倏此而横的吕布，狂愚而逞的袁术，雍容论道的刘表，昏暗懦弱的刘璋，都无戡乱之才，他们的作用是为胜利者驱除，在群雄角逐中注定要被歼灭。志大略疏的袁绍，文武兼资的曹操，弘毅宽厚的刘备，任才尚计的孙权，都有统一天下之志，任人有方，馭才有术。而后袁绍败亡，演成了三分之局。

官渡之战奠定了北方的统一，消除了一个争天下的强手；赤壁之战曹操受挫，孙刘之势强，于是奠定了三分之势。本来这两次战役都有混一天下的可能。袁绍鹰扬河朔，雄视天下，若官渡之战袁胜曹败，袁绍君临天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曹操统一北方，“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①，若赤壁战胜，称孤道寡乃必然之势。但这两次战役都是强者败，弱者胜，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从而改变了历史的天平，使偶然因素变成了必然之势。这里的“偶然”，是指曹操官渡告捷，孙刘赤壁战胜，带有“偶然性”；但“偶然”胜利之后，使形势逆转，成为了不可战胜的强者，这就是“必然之势”。反过来说，叱咤风云的袁绍和曹操，不听谋臣劝谏，丧失了取胜之道，只是“偶然”的一着失计，造成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的“必然”后果。

^① 《三国志·吴主传》裴注引《江表传》。

袁绍之败 袁绍在官渡之战以前一直是走上坡路的。他积聚了许多争天下的优势。袁绍不仅有可恃的袁氏四世五公的政治资本，而且他本人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具有雄略的气质。在政治斗争中，袁绍主谋诛灭宦官，又首倡讨董卓，大得人心。韩馥让冀州，袁绍受之，而豪杰之士多归之，数年之间，遂兼有河朔四州，天下无敌。沮授、田丰、审配、逢纪、辛评、辛毗、郭图、许攸等智士为之谋，鞠义、颜良、文丑、高览、张郃等勇士为之统其军。但是官渡之战，袁绍一败涂地，从胜利的顶峰跌落下来，坠入了灭顶的深渊。袁绍官渡之败的主要原因是因胜而骄，一意孤行，以个人之智敌曹操之群士。他不纳田丰之谋，不用沮授之计，既要急于进取，而又坐失战机，不在曹操东征刘备之时进军，焉能不败？袁绍外宽内忌，能聚人而不能用人，不仅荀彧、郭嘉、董昭等智士离他而去，就是效死之士如沮授、田丰等也无所施其能。张郃、许攸则因其计不用，愤然阵前倒戈。袁绍逞个人之智，又碰上了曹操这样一个棋高一着的对手，他就难逃覆败的命运了。官渡之败暴露了袁绍的弱点，他不是曹操的对手。在奉迎献帝问题上，袁绍拱手让曹，就输了一着。然而这是对全局成败有决定性影响的一着，袁绍输了，处处被动。曹操赢了这一着，全盘皆活，处处主动。袁曹二人相较，袁绍凭藉的是“力”与“地利”，曹操依靠的是“智”与“道术”，两人政治素质的优劣不待分辨而高下自分。《武帝纪》中有曹操与袁绍如下的一段对话：

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袁绍实现了他的“南据河，北阻燕、代”，也可算得上群雄